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6/57
22 February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

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5/7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了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第1995/75号决议。委员会在此决议中重申对不少个人和团体因设法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而受到恐吓和报复的报导以及对某些个人受阻而无法利用联合国主持拟订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程序的报导表示关切,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行动恐吓或打击报复:(a) 寻求或业已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向它们提供证据或情报的人;(b) 寻求利用或业已利用联合国主持拟订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程序的人以及所有为此目的向它们提供法律援助的人;(c) 根据人权文书所定的程序寻求提交或业已提交材料的人;以及(d) 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家属。

2. 委员会请求联合国各人权机构的所有代表以及监测人权遵守情况的条约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采取紧急措施,协助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阻碍人们利用联合国人权程序,并协助防止发生这类恐吓和报复事件。委员会还请这些代表和条约机构在各自提交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或大会的报告中继续载述据称利用联合国人权程序而受恐吓、报复和阻碍的事件,同时述及各自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3. 委员会要求秘书长提请这些代表和条约机构注意该项决议,并请他向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载述、汇编和分析从所有适当渠道收到的关于该项决议所指打击报复事件的任何材料。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5/75号决议收到的材料以及 人权机构代表采取的行动情况

4. 本章概述根据第1995/75号决议收到的材料,其中述及人们因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或因利用国际程序或因是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家属而遭恐吓或报复的许多情况。

5. 如果受害个人或组织曾与人权委员会的某一机构或机制联系,那么,一旦收到请求,即由委员会中负责有关工作的适当机构或代表采取保护行动。在多数情况下,则紧急致函有关政府。提交委员会的前一份报告阐述了迅速干预程序(见E/CN.4/1992/29,第14至第18段)。本报告载入了政府对来文所作的有关答复。

6. 须指出的是,本报告只概述每一机制在最近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列的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A.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6/4)

7. 在1995年期间,根据第1995/75号决议,特别报告员继续发出紧急呼吁,敦促有关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保护受到威胁或恐吓以及据报可能会遭到法外处决的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证人、家属或其律师。

阿根廷

8. 1995年4月5日,特别报告员向阿根廷政府发出紧急呼吁,对 Plaza de Mayo 母亲组织主席的女儿 Maria Alejandra Bonafini 的安全表示担心,因为有人不满该组织主席的工作而威胁要杀掉她的女儿。

9. 阿根廷政府在1995年9月27日的来文中就特别报告员为 Maria Alejandra Bonafini 发出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称有关当局已着手调查此案。

布隆迪

10. 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4月访问布隆迪情况的报告(E/CN.4/1996/4/Add.1)中提到,有人威胁要杀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驻地代表和非统组织观察团驻穆因加省的指挥官。他还提到,有人在当地多份报刊上著文恐吓秘书长派赴布隆迪的特别代表。这三位人士都与联合国各人权机构和机制(包括本特别报告员)进行了合作。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还提到,1994年8月,据说负责调查在基龙杜省基里市发生的屠杀100多位难民事件的难民署一工作人员在基龙杜遭军人杀害。

哥伦比亚

11. 与联合国人权程序合作的各人权组织的成员继续遭到保安人员的恐吓。有人威胁要杀害 Corporacion Colectivo de Abogados "Jose Alvear Restrepo" 的以下成员: Luis Guillermo Perez Casas、Alirio Uribe Munoz、Eduardo Carreno Wilches、Reinaldo Villalba Vargas、Pedro Julio Mahecha Avila、Rafael Barrios Mendivil 和 Katia Karina Nino Vargas。这些人都是人权律师,

因工作关系而遭恐吓。特别报告员为此于1994年12月7日和1995年1月20日发出两份紧急呼吁。该组织的成员 Javier Alberto Barriga Vergel 后来遇害。特别报告员闻讯后于1995年6月22日发出第三份紧急呼吁,要求当局保护这些人士。

12. 该国政府在1995年2月2日和3月28日的来文中通知特别报告员,有关部门已开始调查此案,并已采取措施来保护上述人员的生命安全。政府在1995年8月22日的一份来文中进一步告诉特别报告员,有关方面正在调查 Javier Alberto Barriga Vergel 遇害案。

危地马拉

13. 1995年2月16日,特别报告员为 Grupo de Apoyo Mutuo por el Aparecimiento con Vida de Nuestro Familiares (GAM)的成员 Senayda Cana Chanay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位女士险些遇害,后来据说又遭到前去保护她的警察的骚扰。

14. 1995年3月13日和4月11日,特别报告员请求当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危地马拉人权组织全国阵线的代表 Miguel Sucuqui Mejia、Juana Tipas Gonzales、Emilia Garcia、Samuel Hernandez、Daniel Pascual Hernandez 和 Guillermo Fernandez 的生命安全。特别报告员担心这些人士在参加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后回到危地马拉时遭到打击报复。

15. 政府在1995年6月6日的一份来文称,有关部门正调查 Senayda Cana Chanay 案件。

秘鲁

16. 1995年6月30日,特别报告员为下述人士发出一份紧急呼吁:Antonia E. Saquicuray Sanchez(法官);Ana Cecilia Magallanes(检查官);Barrios Altos 和 La Cantuta 地区大屠杀死难者家属;Rodolfo Robles Espinoza 将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和 Tito Guido Gallegos Gallegos(人权律师)。有人威胁要杀害这些人士,因为他们反对1995年6月颁布的赦免法,反对停止对过去侵犯人权行为的一切调查和法律诉讼。

17. 特别报告员后来得知,有人不满 Tito Guido Gallegos Gallegos 为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进行辩护,仍扬言要杀害他。特别报告员为此于1995年7月17日和9

月11日再次发出两份紧急呼吁。

18. Barrios Altos 大屠杀一位幸存者的律师 Gloria Cano Legua 因工作关系受到死亡恐吓。特别报告员为此在1995年7月14日的一份函件中对这位女士的生命安全表示关切。

19. 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11月21日为下述人士再次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Susana Villaran、Francisco Soberon 和 Ernesto de la Jara(人权积极分子); Gisela Ortiz 和 Raida Condor(La Cantuta 大屠杀死难者家属); Heriberto Benitez(律师); Rodolfo Robles将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 以及 Henry Pease、Javier Diez Canseco 和 Gustavo Mohme(议员)。有人向人权协会办事处送了十字形花圈, 扬言要杀害上述人士。

20. 据说恐吓者是与军队情报署有瓜葛的一个敢死队。上述人士因积极要求当局撤回1995年6月在秘鲁生效的赦免法而得罪了一些人。

21. 应指出的是,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非法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于1995年8月2日致函该国政府, 对这项法律的通过表示深切关注。他们强调指出, 赦免法助长了有法不依的气氛, 剥夺了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违背了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

22. 政府于1995年10月9日答复说, 已采取措施来保护 Gloria Cano Legua 的生命安全。政府在答复中还称,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军队卷入了这些恐吓杀人事件。

斯威士兰

23. 1995年7月17日, 特别报告员向斯威士兰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 要求该国政府保护斯威士兰工会联合会秘书长 Jan Sithole 先生。随着政府与工会会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警察威胁要杀害 Jan Sithole 先生。特别报告员获悉, 1995年6月, Jan Sithole 先生在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后回国时, 移民署署长要他交出护照。Sithole 先生可能会被赶到莫桑比克。

B.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见E/CN.4/1996/38)

24. 象前些年一样, 根据第1995/75号决议, 工作组紧急致函有关政府, 敦促当

局采取措施,保护失踪者的家属或与工作组合作的其他个人或组织及其法律顾问,使其免遭恐吓、迫害或报复。工作组请有关政府报告这些案件的调查工作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情况。

哥伦比亚

25. Italo Rodriguez Carvajal 先生采取了一些行动,想了解弟弟 Alvaro Rodriguez Carvajal 失踪和遇害事件的真相,有人为此威胁要杀害他。工作组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95年8月22日向哥伦比亚政府发出了一份急电。“下落不明的被拘留者家属协会”主席 Yanette Bautista 女士因工作关系遭到恐吓和骚扰,工作组为此于1995年9月14日发出一份急电。工作组在此份电报中还提到 Astrid Liliana Gonzalez Jaramillo 和 Sandra del Pilar Ubate Monroy。有人阻拦这两位女士去卡利地区检察院作证和协助调查 John Ricardo Ubate 和 Gloria Bogota 失踪案件,否则就要杀掉她们。威胁这两位女士的人自称是国家总检察署和司法调查与情报署的工作人员。为了保护这些人士,工作组于1995年10月4日再次发出急电。

厄瓜多尔

26. 人权组织的成员和失踪人士的家属经常会面,要求官方调查失踪案件,但据说因此遭到国民警察的恐吓和骚扰。1995年2月14日,工作组为此向厄瓜多尔政府发出一份急电。工作组在此份函件中还提到,退役的国民警察 Hugo Espana Torres 的证词对 Carlos Santiago 和 Pedro Andres Restrepo 失踪案件的法律调查工作极为关键。据说这位退役警官因指责国民警察卷入了 Restrepo 兄弟俩失踪案件而遭到国民警察的威胁。

危地马拉

27. 1995年8月22日,工作组向危地马拉政府发出了一份急电,要求保护下述人士:负责调查武装反对团体领导人 Efraim Bamaca 失踪案件的检察官 Eduardo Arango Escobar 博士;Jennifer Harbury (Bamaca 太太);退伍军人 Angel Chizas Garcia。这位退伍军人作证说,他看到 Bamaca 先生被关在一军营,而不是

象军方所说的那样死于交战中。据说仍有人威胁要杀害这位检察官和退伍军人。据说大约有40人到可能挖尸地点取闹,要挟 Bamaca 太太。

洪都拉斯

28. 1995年8月15日,工作组紧急致电洪都拉斯政府,请求政府保护下述人士:洪都拉斯失踪人士家属委员会成员 Leonel Casco Gutierrez;因指控一位前高级军官贪污腐化而于1995年1月4日遇害的退伍军官 Juan Pablo Rivas Calderon 的家属及其险些遇害的儿子 Juan Pablo Rivas Jeresano;全国保护人权专署、洪都拉斯失踪人士家属委员会和洪都拉斯保护人权委员会的成员(有人阻拦他们调查失踪案件,并扬言要杀害他们);以及《时代日报》的记者(有人因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洪都拉斯失踪人士下落的报导而扬言要杀害他们)。

墨西哥

29. 1995年1月11日,墨西哥政府就工作组1994年9月27日急电作了答复。工作组的急电涉及据报有人恐吓、骚扰和报复:失踪人士家属委员会“Eureka”的成员;Fray Francisco Vitoria 人权中心的工作人员;全国保护被监禁者、被迫害者、失踪者和遭政治流放者独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墨西哥人权报导和监督中心的工作人员(见E/CN.4/1995/53,第11段)。该国政府称,据说应对这些事件负责的有关当局矢口否认。墨西哥全国人权委员会为此已正式致函各有关非政府组织,请求它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其申诉,以便确定在此方面应采取何种适当措施。

C. 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6/95)

中 国

30. 1995年8月31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中国政府,其中提到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1月19日至30日访问中国期间曾会见于1994年11月6日获释的西藏高僧玉洛达瓦次仁法师(E/CN.4/1995/91),该位法师现被秘密囚禁在拉萨市热普色(译音)区一所房屋中。特别报告员提醒中国当局注意,在访问期间,中国当局曾许诺说,玉洛达瓦次仁法师在与特别报告员谈话后不会受到处罚。

D. 危地马拉人权情况独立专家
(见E/CN.4/1996/15)

31. 在1995年期间,独立专家得知,该国曾发生负责审理人权案件并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的司法人员遭到恐吓的几起案件。有人威胁要杀害:危地马拉总检察长 Ramses Cuestas 夫妇及其家人;负责调查 Xaman 大屠杀中13位流离失所者遇害案件的特别检察官 Ramiro Contreras;和负责调查 Ffrain Bamaca 失踪案件的检察官 Julio Arango Escobar。1995年6月22日,据说一位不明男子对 Julio Arango Escobar 的办公室开枪,此后,该检察官以个人原因为由撤出此案。

E. 伊拉克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6/61)

32. 特别报告员得知,1995年8月15日,在巴格达第14号 Ramadhan 大街上,一辆小汽车压死了横穿马路的一位伊拉克妇女,并重伤两人。据特别报告员获得的材料,这位妇女的哥哥从事了保护人权活动,其中包括向几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材料,所以,这次袭击纯属报复。

F. 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6/65)

33. 1996年1月15日,特别报告员致函缅甸政府,对国会议员 Saw Naing Naing、律师 Monywa Tin Shwe、思想犯 U Win Tin、杂志编辑 Myo Myint Nyein 和国会议员 Myint Aung 的安全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获悉,监狱管理人员开始审讯这五名犯人,追问他们从 Insein 监狱偷运出信件并交给特别报告员的经过。结果,这五人被迫睡在水泥地上,而且无缘接近家人。特别报告员提请缅甸当局注意第1995/75号决议的规定。

G. 卢旺达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5/68)

34. 特别报告员获悉,该国发生了与联合国各人权机制接触或向特别报告员提

供情况的个人遭到恐吓和打击报复的几起案件。有人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负责 UNAMIR 电台 Kinyarwanda 地区32岁的记者 Manasse Mugabo 1995年8月19日离家经 Gatuna 边境检查站前往乌干达时被迫失踪的案件。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卢旺达捍卫人权联盟和协会联合会会长 Jean Baptiste Barambirwa 先生在1995年12月11日上午被包括一位武装士兵在内的4名男子逮捕。Barambirwa 先生是因前一天晚上在基加利“外交官旅馆”人权周闭幕式上发表演说而被捕的。据说他在演说中批评了卢旺达的一些人权问题。据特别报告员了解的情况,在关押期间,有关人员审讯 Barambirwa 先生,要他解释演说中的几点内容。

35.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基督教民主党副主席兼卢旺达促进和保护人权联合会成员 Theobald Gakwaya Rwaka 先生于1995年11月18日在 Nyarugenge 乡 Nyakabanda 处被一群警察逮捕。该位人士的被捕原因是,曾在8月份关于逮捕和拘留程序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言,批评该国的人权状况。在关押期间,警察审问了该次演说情况。Theobald Gakwaya Rwaka 先生已于1995年12月14日获释。

36.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有人多次恐吓 Kinyamateka 的编辑兼卢旺达捍卫个人权利和公众自由协会主席 Andre Sibomana 先生。据说该人大力谴责卢旺达前政府和现政府侵犯人权行为。

H. 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6/62)

37. 苏丹政府代表在大会第50届会议上就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作了答复,并提到不准特别报告员前往苏丹的理由。苏丹代表在答复中说,“如果特别报告员象在这份临时报告中所作的那样,继续伤害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感情,对其下场,我们不想妄加推断。”

38. 此外,苏丹政府代表还就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作了如下发言:

“特别报告员在临时报告中间接呼吁废除伊斯兰教法,该份报告第82段(a)小段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关于这一间接呼吁的实质,我们将在评论临时报告第26段时解释这一呼吁如何侵犯了宗教自由。我们为此呼吁大会:(a) ...; (b) 采取必要的矫正措施,安抚由于该份报告的内容无理挑战伊斯兰教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担保他不会遭到萨勒曼·鲁什迪先生同样的下场”。

I. 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6/63)

39. 特别报告员获悉,积极促进和捍卫人权的律师、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频频受到匿名电话或恐吓信的骚扰。有些人还因人权活动而受到警察审讯。

40. 据说因开展人权活动并与联合国机制合作而遭到恐吓和骚扰的人士有: Split 市达尔马提亚人权委员会会长 Tonci Majic; 达尔马提亚人权委员会委员 Miso Rogosic; Split 市达尔马提亚声援委员会会长 Ivan Ozic; Split 市律师 Mirko Franceschi;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主席 Ivan Yvonimir Cicak;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副主席 Slobodan Budak; 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委员 Petar Mrkalj; Dubrovnik 市律师 Branka Skansi 女士; Dubrovnik 市律师 Srd Jaksic; Karlovac 市律师 Dusan Busic; Karlovac 市律师公会前任会长 Dejan Dejanovic; Karlovac 市律师 Dorde Stojakovic; Karlovac 市法官 Vaso Dobric; Karlovac 市律师 Nikola Pavlovic。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前南斯拉夫领土期间会见了其中一些人士。

J. 扎伊尔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见E/CN.4/1995/67)

41. 在1995年期间,特别报告员得知,正在 Lubumbashi 人权和人道法律中心实习的国际人权法小组成员、美国法学院学生 Mohamed Amr Razzak 先生于1995年7月13日被捕并被带到国家情报和防卫署受审,同时不准他与美国领馆联络。他未受任何指控,第二天就获得了释放,但条件是必须在三天内离境。

42. Muller Ruhimbika 和另外5位 Banyamulenge 族的人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扎伊尔期间与特别报告员会面之后不久在 Uvira 被捕。特别报告员为此于1995年11月23日向扎伊尔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提请它注意第1995/75号决议。Muller Ruhimbika曾呼吁国际社会对扎伊尔政府施加压力,阻止政府驱逐 Banyamulenge 人。

43. 扎伊尔保护人权协会遭到恐吓和骚扰。特别报告员闻讯后于1995年7月12日再次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要求政府保护各人权机构。自1995年2月以来,据说扎伊尔保护人权协会的几名会员遭到当地政府行政人员的骚扰,有时还遭到毒打。此外,1995年2月23日,在 Maniema 地区 Kindu 市,该协会的办事处被勒令关闭。

二、结论

44. 联合国各人权机构和机制获得的材料表明,在若干国家中继续发生了人权积极分子和非政府组织遭到恐吓和报复事件。此外,还发生了对国际人道工作者施暴事件。有人杀害或威胁要杀害联合国官员。

45. 据称报复对象既包括侵犯人权行为的目击者、受害者及其家人,也包括已向联合国各人权机构报告的侵权案件的调查官员,尤其是司法人员。经常向联合国提供人权情况的组织和个人以及与联合国各人权机构的代表见面者也遭到恐吓和报复。与联合国各人权机制合作的联合国官员也成为恐吓和报复的目标。

46. 令联合国各人权机制感到关切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据称应对恐吓和报复行为负责者看来仍逍遥法外,几乎未受任何惩处,这自然助长了类似行为的重演。

47. 还应指出,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有关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多次为这些个人和组织发出紧急呼吁,但有关政府要么拒不作答,要么对函件中关于调查有关指控的要求所作的答复无法令人满意。有时,尽管呼吁有关政府保护人权组织的成员,但一些成员不久后即遇难。

48. 律师和其他司法人员遭到袭击、恐吓和杀害的若干侵犯人权案件未被列入本报告,因为这些人虽然是根据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捍卫人权,但他们援用的是国内补救措施。由于第1995/75号决议的严格规定,无法将这些案件归入该项决议所列的各个类别。在此方面,委员会不妨考虑是否要扩大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列入个人因援用国内外保护人权程序而遭骚扰和恐吓的案件,以此促进特别报告员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XX XX XX XX XX